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朱利民¹,朱昭²,马妍³

(1.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3.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知识储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关键词:“静安之学”;“通人之学”;“专人之学”;二重证据法;敦煌

中图分类号:I207;B259.9;K8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9)06-0093-08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n the studies of “wide general knowledge” and “special expertise” by WANG Guowei

ZHU Limin¹, ZHU Zhao², MA Yan³

(1. X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Shaanxi,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ideas of WANG Guowei, such as the “study of wide general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special expertise”, are major innov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By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growth of WANG Guowei, analyzing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demonstrating his academic thought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收稿日期:2019-09-11

作者简介:朱利民(1963-),男,陕西西安人,教授。

on the “learnings by WANG Guowei”. Research believes that with a solid knowledge reserve, WANG Guowei critically inherited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ideas. He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practice in terms of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system of China’s liberal arts, the academic system of studying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scholar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pioneering achievements, and can be thus said to be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that leads a new generation of ethos. WANG Guowei, with his academic thinking in pioneering inno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wide knowledge and dedicated focus, created a dual evidence method, and explored and developed a research approach from the “study of wide general knowledge” to the “study of special expertise”. The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WANG Guowei’s learnings can help us emulate those better than ourselves and discard the old for the new, by disciplining our atmosphere of learning, rectifying our attitude of academic research, advocating academic contentions and discussions, identifying and s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eliminating academic frauds, and standardiz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processes.

Key words: “learnings by WANG Guowei”; “study of wide general knowledge”; “study of special expertise”; dual evidence method; Dunhuang

王国维的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研究选题。历经 10 多年的爬梳,我们查阅到国内外关于专题研究王国维的宏文巨著多达 7 791 篇(部),其中代表性观点结论仁智各见,各领风骚,在此不做赘述。经过系统审读王国维文集以及衮衮诸公的研究成果后,晚辈后学心怀敬畏,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

阮文达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中开宗明义地讲,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王国维及其论著历经时空滤色、时代扬弃和学人的批判继承,业已成为静安之学。晚辈后学无力将王国维的学术历程还原成立体之现场,所以只能凭借通读王国维文集来感受“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 20 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2]。也只能通过力争读懂静安之学来感同身受“五四”一代学人的理想追求与治学初衷。

一、管窥蠡测王国维

王国维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乃

至世界学术界的一座高峰,其系列研究成果是一块学术高地。要想穿越高地,仰望甚至攀登高峰,需要通读静安之学。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中所讲:“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3]上海师范大学钱剑平在《一代学人王国维》后记中道出吾辈后学之心声:“比肩但丁是困难的,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达到但丁的高度呢!人们不都是在努力中成为但丁的后人的吗?”^[4]

第一,顺世而生。王国维,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生于 1877 年 12 月 3 日,初名国桢,字静安,号礼堂、观堂、永观。王国维幼、少年时期正值列强侵袭,纲纪殒,西学东渐,传统道断。中国传统家庭认为子女走科举取士之途才是万变不离其宗,才能光宗耀祖。幼年的王国维得益于潘紫贵、陈寿田的戒尺棒喝与耳提面命,国学底子得以夯实。少年的王国维因填词《蝶恋花》,作《挽诗》《九月团脐十月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七八月之间雨集,夜归读古人书,被同学誉为“海宁四才子”之首^[5]。1892 年 7 月,王国维参加海宁州岁考,取得

第21名;参加海宁州生员考试,取得第60名。1893年4月至7月,乡试考试失败。1894年春,王国维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1897年9月,王国维参加最后一次乡试失败后,他绝意科举,潜心攻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三代两汉之古籍,全部烂熟于胸^[5]。他阅读《盛世危言》《天演论》《时务报》,推敲《群经平议》并撰文与俞樾商榷,同窗好友评论“静安文太高,不肯入时流范围”^[5]。此时,王国维敏感到世界学术潮流之汤汤与中国学术研究转型前之阵痛,义无反顾地步入自己“独学”道路。

第二,独学之王国维(1898~1910)。1898年至1902年,王国维在《时务报》报社和东文学社半工半读期间,先后得到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和罗振玉、欧矩甲、许默庵等人的提携与点拨,译编《农学报》,翻译赫尔姆霍兹的《能量守恒的理论》、立花铤三郎的《教育学》、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牧濑王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之良勇次郎的《伦理学》《心理学》和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为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隲藏《支那通史》《东洋史要》写序,撰写了《曲品新传奇品跋》《崇正讲舍碑记略》《欧罗巴通史序》等文章。经过4年的砥砺,王国维的学术视野大为改观,他认为世界学术发展会加速中国学问研究从通人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演变,会导致中国传统学科的重新分类。

为应对世界学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王国维借助日语、英语,以研读欧洲哲学为切入点,储备科学知识,在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中提升思辨水准。王国维第一篇哲学论文《哲学辨惑》刊登在1903年7月《教育世界》第55期。《哲学辨惑》一文的初衷在于批评张之洞“哲学有害无益”的学术观点,纠正人们对哲学这门科学的误解与偏见^[6]。今天,重读《哲学辨惑》,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貌似哲学的心灵鸡汤,而且可以防止即插即用U盘式的拿来主义,更可以杜绝魏晋南北朝曾出现过的“清谈误国”^[7]。

王国维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于1904年在《教

育世界》连载5期刊出,它是中国美学评论之开篇,开创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

写诗填词绘画是中外学人的生命组成,是学之别体;写诗填词绘画对于“五四”一代学人而言,与其说是一个传统,倒不如说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8]。王国维擅长诗词创作与研究,1904年至1910年,王国维填词106阙写诗30首。王国维将1904~1907年所填词先后集成《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出版,其主旨“境界说”是对传统文学评论的创新,也是他个人阶段性治学所得^[9]。

第三,勃发之王国维(1911~1927)。34岁之后的王国维,学术研究与道德文章如日中天。1911年,王国维撰写的《隋唐兵符图录附说》为研究古器物学之始;1913年,王国维依据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参考《史记》《考工记注》《三礼图注》《明堂通释》《释宫小记》和《隋书》,对古代居室、宫室宗庙和明堂逐一考释,撰成《明堂庙寝通考》;1915年,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对司马迁提出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的观点进行订正,首次提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10];1913年《宋元戏曲史》的出版,不仅是宋元戏曲史上拓荒性工作,而且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之圭臬。胡适在《归国杂感》讲:“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11]傅斯年推荐《宋元戏曲史》是“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12]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评价《宋元戏曲史》《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13]。

1917年,王国维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的要旨在于“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未有如此之贯串者”,代表着当时世界学术界系统研究夏商周三代之最高水

平。鲁迅谨慎地赞许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4]梁启超对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赞不绝口:“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15]

第四,异世而立。哲学是对人类的生活思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说:“表面上似乎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表面利益相去甚远的思辨哲学,其实是世界上最能影响人们的东西。”^[16]王国维出于对人生问题思考与学术发展变化之需要,对西方哲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情有独钟。

第五,王国维之哲学研究。哲学家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哲学家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工具。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1903~1907年,王国维以欧洲哲学为研究学问之纲,潜心阅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4遍,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两遍后,翻译、撰写了《哲学辨惑》《西洋伦理学史要》《尼采之学说》《叔本华遗传学》《康德像赞》《康德之哲学说》《康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德国哲学大家康德传》《叔本华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歌德之家庭》《亚里士多德传》《卢梭传》《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性》《释理》等欧洲哲学家的论著。

王国维以补救中国古代哲学追求完整理论体系为己任,从中国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切入,使逻辑学在国故研究中得以普及、发展。王国维在《去毒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屈子文学之精神》《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中反复强调哲学是一门学问,是理论方法的基础和思想武器,是其它学科

的归宿。1905年,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指出,梁启超所鼓吹的康德是政治需要之康德,而不是哲学之康德。王国维讲:“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苦嗜者也。然而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王国维的烦闷正是“五四”一代学人之烦闷,因为现代哲学使哲学与哲学家分离的特点,改变了哲学的价值。正如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写到:“这种改变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17]现代哲学发展与社会实践证明,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仰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第六,王国维之文学研究。文学是对人类的生活描写。王国维认为介于科学与史学之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18]。

1907~1915年,王国维主要从事文学研究。他在《三十自序》中讲到,研究重点在宋元戏曲。王国维搜集宋元戏曲词目作考订,撰《古雅之在文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词录》;编辑《曲录》六卷,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成《戏曲考源》一卷;搜集唐宋滑稽戏五十则,作《宋大曲考》《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古剧脚色考》《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作《〈词林万选〉跋》《曲品新传奇品跋》《雍熙乐府跋》《罗懋登注拜月亭跋》《〈梅苑〉跋》《〈碧鸡漫志〉跋》《〈宁极斋乐府〉跋》《〈欧梦词〉跋》《〈花溪志〉跋》《〈乐章集〉跋》《〈元曲选〉跋》《〈续墨客

挥犀》跋》《盛明杂剧跋》;从《梅苑》中录得《孤雁儿》补入《漱玉词》。1913年,王国维撰成《宋元戏曲考》,出版刊行书名为《宋元戏曲史》。

第七,王国维史学之研究。史学是对人类的生活纪实。王国维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18]

1913年至1927年,王国维转向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研究重点在夏商周三代。期间,王国维撰写了《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前编》《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史籀篇疏证》《周书·顾命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19]。

总而言之,王国维在哲学、文学、历史学领域,一路学习,一路发现,一路研究,一路借鉴,一路转向,一路创新。孙绍振在《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第三次印刷前言中写到,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平“这对一般读者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但是,对理论家来说,并非苛求。从另一方面讲,阅读之初,也许距离但丁远甚,但是,在阅读中进入分析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升腾到接近作家的水准,是原本狭隘的心理预设和作品的丰富内涵的一场搏斗,越是接近作者的水准,越可能迎来阅读的胜利,相反则是失败。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说不尽的哈姆雷特,说不尽的阿Q,说不尽的林黛玉,这不是米勒所设想的纯粹文字游戏,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把自己的智慧不懈地奉献上经典文本的历史的祭坛。愿把《文学文本解读学》证明的希望交给文本的解读和文本解读的历史”^[20]。在此,我们借孙绍振的吉言善语,把寻觅“五四”一代学人追求民主科学的初心,解读静安之学的希望,托付给穿越学术高地的跋涉者,仰望学术高峰的攀登者。

二、钩玄发微静安之学

王国维坚持国家存亡与学术兴衰同进退。对于清朝历代的学术思想成果,他既没有全部拿来,也没有全盘否定。他客观公正地评价清初学术之大、乾嘉汉学之精和晚清学术之新,肯定孙怡让的学术成就影响后世,更赞扬沈曾植的治学之法为治中国学问的通则^[18]。刘梦溪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的角色是由王国维扮演的,他的学术创获尤得力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2]。因此,静安之学是创辟胜解之学,是通方知类之学。想要真正读懂静安之学,不但要克服学养、学力和体力的坚硬繁难,而且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对“粗俗文学”的思辨能力和批判力量^[21],还要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上,积极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获取静安之学的要义。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创刊作《序》中写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适同人将刊行《国学丛刊》,敢以此言序其端。”自然科学是探究宇宙万物之规律,历史学是寻求人类起源演变之规律,文学是探索人类情感发展变化之规律。王国维较早地把学问分为自然科学、历史学和文学三大类。首先规范了学问的学科谱系,其次提出要从事科学研究必须从自然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入手,最后提出学问没有新旧之分,研究者没有中外之别,研究成果没有有用与无用之说。我们可以从王国维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窥豹见全静安之学。

第一,古为今用之王国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写到:“提倡最高

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22]先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以研究方法创新推动学术研究的吐故纳新,开拓了国故研究的新领域。

传统的经史典籍要成为信史,需要考古新材料的检验。甲骨卜辞有益于经史二学,断简空名,可以实指其地,敦煌写本是补订史实、校勘文献的依凭,封泥印信可以考正古代官职和地理书,陶器、货币上的文字可以断代和考证文化交流和经济社会变化发展。新出土的甲骨卜辞已经证明了《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帝王世系是准确的,所以《史记》是一部信史。传统史家诟病《五帝德》《帝系姓》《山海经》,是因为其记载文字不符合雅驯标准,但地下资料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8]自汉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界有四大发现,第一是孔子壁中书,第二是汲冢书,第三是殷虚甲骨文字,第四是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王国维以哲学家的睿智,对新材料系统分析研究,洞察中国学术发展变化,准确预言世界学术发展走向,在继承中扬弃,在创新中传承,适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是这样论述二重证据法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3]

法国作家莫洛亚在《雨果传》中写到,时间可以淹没小丘和山岗,但是淹没不了高峰。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意义与实践作用早在王国维那个时代已经显现出来。古史辨学派宗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到:“《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24]1921年春,顾颉刚在北

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时,自己感到震撼。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1922年5月,顾颉刚怀着“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影响之深”向王国维先生问业^[24]。由此可知,顾颉刚先生从对古史“破坏”转向“建设”,无疑是受到王国维的影响。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实践证明,二重证据法影响了几代学人。1930~1939年期间,郭沫若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传儒的《甲骨文字与殷商时代》,吴其昌的《秦以前中国田制史》,董作宾的《五等爵在殷商》,吴其昌的《甲骨金文中所见的商代农稼情况》,顾颉刚的《商王国的始末》,唐兰的《未有谥以前的易名制度》等雄文宏著的面世,标志着“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研究史学、文学和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正如陈寅恪赞扬二重证据法可“示来者以轻轨”^[25],郭沫若认为二重证据法是近代式的^[26]。

第二,洋为中用之王国维。王国维关注真正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外学者,他学其长,采其言,交流互鉴,切磋琢磨,显示出“五四”一代学人系统的学理思辨与文化张力,彰显出中国学者独特的学术话语权。

目前所能见到中国学者最早介绍敦煌考古的译著,是王国维于1910年1月翻译斯坦因博士的《中亚西亚探险谈》。

王国维在罗振玉处看到《太公家教》敦煌遗书后,于1911年7月撰写《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一文,预示王国维从事敦煌学研究之发端。此时的斯坦因、伯希和分别占有《太公家教》12种写本和22种写本。

王国维最初接触到的敦煌资料来自于日本京都大学狩野直喜。狩野直喜将个人1912年游学欧洲时,抄录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和唐人写本,直接寄给王国维,以求指教。

1912年,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得到魏晋简牍981枚,全部交于法国汉学家沙畹。王国维出于学

术上考虑,将自己定稿的《简牍检署考》手抄件寄给沙畹,供其参考。1913年,沙畹将自己考释简牍的初稿寄给王国维以求指正。1914年,王国维和罗振玉对沙畹手稿中出现的533枚魏晋简牍重新考证,整理编辑出版《流沙坠简》3册,它是中国近现代关于西北古代地理研究的凿空之作。

王国维在敦煌唐人写本中发现韦庄《秦妇吟》诗文残存,经过辩读,于1920年4月,在《东方杂志》17卷第8号刊出《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3年,伯希和将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秦妇吟》”和伦敦博物馆所藏“梁贞明五年安有盛写本《秦妇吟》”影印本,寄给王画维以求指导。王国维通过比较《秦妇吟》不同时期的3个版本和内容,于1924年撰写了《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一文。

从1910年至1924年,王国维以哲学家的睿智,假考古学家的判断,用文学家的叙事,对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魏晋时期简牍和甘肃敦煌藏经洞文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第一时间撰写、刊发了《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唐写本残职官书跋》《敦煌石室遗书》《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唐写本大云经疏跋》《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跋》《敦煌汉简跋十四》《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唐写本食疗本草跋》《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残小说跋》《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首》系列论著和诗歌,让敦煌藏经洞文献和尼雅简牍经中国学者精耕细作而绽放异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之一,是纸上资料与地下实物相结合研究的典范,是构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开山

者。正如梁启超、郭沫若评价的那样:“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15]、“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26]。

今天,“五四”一代学人曾经梦寐以求的文化自觉已上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吾辈后学应该在通读王国维,读懂静安之学的前提下,系统反思“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五四”一代学人“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立心、立言、立德!

参考文献:

- [1]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2]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3] 克罗齐.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 朱光潜,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4] 钱剑平. 一代学人王国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5] 王国维. 王观堂先生全集[M]. 台北:台湾大同书局,1976.
- [6] 佛雏. 跋王国维佚文《哲学辨惑》[J].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2):91-92.
- [7]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8] 刘梦溪. 论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C]//王永兴. 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352-425.
- [9] 佛雏. 王国维诗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0] 赵万里,王国华. 王静安先生遗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 [11] 胡适. 胡适北大日记选[M]. 台北:台湾愿景出版公司,1989.
- [12] 傅斯年.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J]. 新潮,1919,1(1):

- 1-3.
- [13] 郭沫若. 鲁迅与王国维[J]. 文艺复兴,1946,2(3): 4-6.
- [14] 鲁迅. 鲁迅全集·而已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5]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6]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逻辑学体系[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 [17] 金岳霖.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8] 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全集[M]. 台北:大通书局,1976.
- [19] 谢维扬,房鑫亮. 王国维全集[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 [20] 孙绍振. 文学文本解读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2] 王国维.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J]. 东方杂志,1906(6):95-103.
- [23] 王国维.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24] 顾颉刚. 古史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25]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6]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